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上接2023年3月17日第B4版)

背起药箱

好景不长，小孩儿得了肺炎。骆驼信在我的牛群边找到我，让我换骑他的烈马尽快赶到他的家里。小孩子发高烧，呼吸急促。如果有青霉素，有点滴，小孩子可能有救，但是我们都不具备。我们焦急地等待公社医生的到来，但是渺无音信。一个弱小的生命一天后死在我的怀抱里。小孩子痛苦渴望的眼神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在一个牧民的蒙古包里见到过一个神奇的蒙古民间医生，他乐观爽朗，因为右手小拇指总是高高地翘着，被牧民称为“翘手指”（朦胧记得蒙语里好像是“格吉格”）。他是接骨专家，身怀绝技，云游四方，来无影去无踪。和内地的手术接骨和打石膏不同，他只用手法把摔断的骨头复位，再用小夹板固定等待愈合。他救治了无数骑马摔伤的蒙古牧民，声名远扬。纵横天地的一场“海聊”之后，他像一阵清风消失在茫茫草原。

一天在放牧时看到巴勒比。她左盼右顾，确定没有人看到，赶快向我走来。她平常见到我们都是弯腰塌背，满脸堆笑，尽显卑躬。这次即使没有旁人，还是压低声音悄悄对我说她的眼睛很痛。翰达的儿子巴图苏和在批斗时用皮带抽打她，铜钩直接刺伤了她的眼球。我观察她的左眼，眼球灰红相间，一片浑浊，看不清白眼球和黑眼球，不知道她是否会永久失明。我下包曾经住在翰达家，真想想不到她的儿子会有这样鲁莽的举动。我给了巴勒比一管红霉素眼药膏消除炎症，并且让她不要告诉别人。她千恩万谢，赶快悄悄走开。

我发放药品会做登记，年终大队结算时再从牧民分红中扣除药费。巴勒比被强制劳动，常常被派做最脏最累的活儿，给最低的报酬或者不给报酬。她像猪狗一样地活着，贫穷而且没有尊严。红霉素不用会过期作废，我不给她登记，她就可以不付药费，减少一次被责骂的机会。医疗救助是施行人道，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坏人”我开始有了怜悯恻隐之心。我曾经问过翰达这个王妃有什么罪行。翰达说巴勒比曾经得意地对别人说：“我们原来住在高高的山上。”

我们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但是文革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和羞辱在基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让一些人人生不如死。在善良的人性后面我也看到了人性的险恶。据说巴勒比的儿子不但会传统蒙文，还懂改用俄文字母的外蒙文字，在大队里他的学历可能是比较高的。由于过世父亲的“王爷”身份，他备受歧视，没有前途和希望。在我离开内蒙的那个冬天，他在大队的一个拴马木桩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为牧民服务，减少了孤独感，也用持续的努力增加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年终我作为知青代表参加了大队评工分的会议。队长赛因

拉玛认为必须给我加一份做卫生员的工分，与会牧民一致同意。我坚持说做卫生员是业余的，如果要双份工分，对大家不公平，我放牛的工分已经让我衣食无忧。双方争执到最后，我只接受了因为救治病人而误工的工分补偿。我帮助了牧民，也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和亲情。这在北京的文革风暴中是享受不到的，我感到弥足珍贵。

下包

1968年夏天刚到牧区插队时我们没有放牧任务，感到不能长久如此了，便向大队要求工作。开始的热闹过去了，到了实际的工作安排还真让大队为难。一个畜群组只需要四五个劳力。我们十四个没有丝毫畜牧经验的大男大女不可能自包牛羊放牧，也不会独立搬家转场。

知青组长陈江涛和大队讨论了几次，没有找到一个可行方案。秋天到了，天气渐凉，外面传来了牧区知青和贫下中牧相结合、分散住到牧民家参加放牧劳动的消息。这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我们做了下包的准备。

我成了队里第一个下包的人。贫牧翰达老太太威风凛凛地骑着大骆驼，满脸笑容地到知识青年驻地，把我接去住在她家，担任浩特牛信。

翰达是个单身女人，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蒙古人视力好记性好。他们笑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瞭见一个骑白马的喇嘛到翰达家过夜，之后某年某月某日她的哪个孩子出生。早年牧民的性生活都很开放，并不引起别人的非议。作为贫牧的翰达也受到大家的尊重。

翰达的女儿们都出嫁了。和翰达同住的还有她的两个外孙女，是她大女儿单木登曹婚前所生。两个孩子的父亲即便是母亲当前的丈夫，当地的风俗是把婚前子女留在外祖母的蒙古包里。

翰达的儿子巴图苏和是个马信，十八九岁，没结婚。马群活动范围大，马信走到哪里住到哪里，他又有女朋友，所以很少在家里过夜。他骑马摔断过腿，格吉格给他接骨治疗，伤好后走路稍微有些跛，所以牧民叫他“道格楞巴图苏和”（瘸腿巴图苏和）。

锡盟草原人烟稀少，牧民之间的关系比汉文化简单淳朴得多。别人称呼翰达“哈麻勒怪翰达”（没鼻子翰达），她不生气，习以为常。她患三期梅毒，虽然传染性降低了，但是鼻梁塌掉了，在她的大脸庞中间只剩下一个扁平的鼻头。她平时穿棕红色袍子，剃光头，像个尼姑打扮。

翰达每天早起煮奶茶，我们用滚烫的奶茶泡粮店买来的炒米作为早餐。炒米是炒熟的黄糜米，比小米粒大。放牛归来我会给全家做晚餐。空闲时我经常帮家里拣牛粪，和她女儿单木登曹一起用牛车拉“台娄”（椭圆形大木水箱）去水塘取生活用水，也帮翰达做针线，纳地毡。

蒙古人夸奖一个人能干会说“阿吉勒台”。男人

赢得“阿吉勒台”的赞美只需要在套马时身姿矫健，驯马时勇敢智慧，做马具灵巧精致就好了。没事他们可以骑马串门，喝茶唱歌。女人的“阿吉勒台”可是要里里外外一把手，一天到晚不停歇。当蒙古妇女夸奖我“阿吉勒台”时，我不以为然，觉得评价标准对妇女不公平。

我的一群牛有60多头，骗牛用来拉车，母牛用来繁育小牛和提供牛奶。公牛向来是草原上孤独的流浪汉，只在发情期到牛群里造次。有一次我看到两头公牛在草地上打架，各自愤怒地用前蹄刨土，再猛烈地冲向对方，两对牛角抵住不放。我怕牛受伤，牵着马过去要把它们轰开，牧民及时把我制止了。他告诉我，发狂的公牛会攻击我和马匹，挑穿肠肚，造成生命危险。

牛群白天出去吃草，傍晚回到营盘休息。营盘是一块羊群休息过的营地，由于长期的聚集踩踏，地面集结了一层厚厚坚实的羊粪层，隔离了下面的冻土。牛群睡卧在上面可以减少潮湿和寒冷。

蒙古人经验多、眼力好，出门远远一望就知道十几里外的黑点是石头还是谁家的牛群。牛信除了河塘干涸时会到水井汲水饮牛，天气好时一般不跟群放牧。他们一天光顾几次牛群，圈赶他们到水草丰美的地段。如果傍晚牛群没有自动返回营盘，再骑马把它们赶回来。我没有那么好的眼力，只要牛群离浩特远一些，就会跟群放牧。

在翰达的蒙古包里总有些家务事要做，不可能躲在一角看书。在大草原上天高地远，和牛群相伴，可以读书。看累了就敞开通风，消灭内衣里的虱子和粘在衣服缝上的虱子（虱子卵）。吃饱的虱子可以看到它红鼓鼓的肚子，里面是你的血。掐死的虱子多了，手指甲盖上留下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们在牧区，尤其是下包住到牧民家里，没有机会洗澡，换洗衣服也很难得。每个下包的知青都难免地招上了虱子。而头发里的虱子是不同的品种，虱子会牢牢地粘在发丝上。

我把和虱子的战斗绘声绘色地写在给妈妈的信中。在“牛棚”看管妈妈的女学生读到我的信时，为内蒙生活的艰苦大为震惊。而妈妈则对女儿在艰苦生活中的乐观而感到骄傲。

冬天天畜用水都靠雪水。我们用捡粪用的柳条筐把雪背回家，当大锅里的白雪化为清水时，用箬篱撇去浮起的枯草马粪，把水倒在水桶里备用。

在夏草场和秋草场，我们用牛车拉着大台娄从水井或河塘取水家用，一台娄水可以用多日。夏营盘地势最低，水井较浅，井水清凉，但是因为井水含盐碱口感不好，所以牧民宁可到河塘里取用地表水。河塘水饮马饮牛饮羊，不乏牲畜的排泄物。待河塘干涸，我们到水井汲水饮牛，而人用水则常常在干河塘附近挖个小坑，慢慢收集渗透出来的清水。

在牧民家居住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可以放心使用的洁净水刷牙洗脸。加上翰达用她特殊的方式对我的关爱—常常在我入睡睡前给我嘴里塞一块冰糖，我很快开始有了蛀牙。草原上没有牙医，我的蛀牙在几个月内发展到疼痛难忍，只好用手指按压穴位得以缓解。一直到1970年夏天到北京探亲时我才有机会到口腔医院医治。